

有机马克思主义：富有解构性的 “流量”思潮*

杨丽婷

[摘要] 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界正式出场后迅速掀起“流量”效应，这与其所进行的“策略性”理论形态转变直接相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四个自信”的夯实促使“有机马克思主义热”从早期阶段的“狂热期”进入后期阶段的“冷静期”。有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其号称的所谓融合“中”“西”“马”的新范式只是一种简单外在的理论嫁接。该思潮以超越为名行解构之实，企图从历史观、方法论、价值取向、理论本质四个维度解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理论风险。

[关键词] 有机马克思主义 过程哲学 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23)03-0062-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①科学研判各种国外社会思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使命职责。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因为直接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号，以最快的速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学者的介入和推动强化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元素”，掀起了一阵学术“狂欢”，俨然形成一股“有机马克思主义热”。

何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它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生态主义思潮，以美国的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和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为代表，以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为己任，是生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语境演变与意识形态认同的关联机制研究”（项目号18BKS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丽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广州 510635

① 习近平：《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09月30日，01版。

主义最活跃的支流之一。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治愈的病症，只有基于共同福祉的“第三条道路”才是真正出路。2014年5月，在美国后现代过程研究中心和中央编译局联合举办的第八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柯布和克莱顿等人对有机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阐释，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界正式出场。随后，有机马克思主义迅速形成“流量效应”。这与其所进行的策略性理论形态转变直接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不断建构完善和“四个自信”的不断夯实促使学界的研究从早期阶段的“狂热期”步入后期阶段的“冷静期”。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成为反思的核心议题，有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具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它所宣称的所谓融合“中”“西”“马”的新范式只是一种简单外在的理论嫁接。该思潮最大的理论风险在于以超越马克思主义为名行解构马克思主义之实。

一、“流量”效应：“策略性”的理论形态转变

早期阶段，研究成果以引介为主，主要介绍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生成演进历程、理论主张和理论性质等，以肯定甚至推崇为总基调。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态势呈现出富有特色的“流量效应”。^①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性和契合度成为许多支持者津津乐道的焦点，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中国引领论”被有些支持者大力宣传。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被迅速地确定下来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有学者称之为“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学者将之定位为“正在生成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厚道马克思主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甚至有学者断言，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融合“中”“西”“马”的新范式，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作为新思潮，有机马克思主义为何会被迅速定性且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俨然形成一股“有机马克思主义热”？笔者认为，这与其进入中国后所进行的“策略性”理论形态的转变直接相关。

一是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主动亲近主流意识形态。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克莱顿指出：“有机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学习了许多东西，因此欠下了一笔厚重的‘思想债’。”^②他们普遍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和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并没有过时和失效，其主要观点迄今依然令人信服。他们多次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有机思想和过程哲学，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思维的深度结合，“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思维的结合为政治理论和人类政策制定指出了最有希望的方向”^③。由此可见，该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亲近”态度，试图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取得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共识”，以此获得在中国学界的发展空间和讨论热度。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一个主动冠以“马克思主义”名号的社会思潮，自然是要主动关注研究的。而有机马克思主义似乎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话交流融合的实践样本，从表面上看，有机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回应了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因

^①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22年，以有机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研究文献高达243篇，其中学术期刊的研究论文203篇，学位论文30篇。2015年发文量为12篇，2016年迅速上升到74篇，2017年达到高峰值94篇，2018年热潮消退，但也有37篇，2019年减为14篇，2020年后降为个位数。

^② 任平、[美] 菲利普·克莱顿：《生态灾难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拯救地球命运的行动纲领——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江海学刊》2016年第3期，第13、14页。

^③ [美]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12页。

此，无论这一实践样本是否科学，是否真正回应了现实问题，它都会迅速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二是注入中国元素，高度认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流动变化、天人合一等思想与过程哲学有着内在的亲近性，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仁爱 and 合等价值理念和传统生态智慧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由此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明确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试图与中国传统文化取得“文化共识”，以此获得与中国学者的对话基础和文化认同。有机马克思主义甫传入中国之际，恰恰正是我们从国家层面上提出要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时。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策略性”地利用了这一契机，提升了话题热度。但很显然，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理解，是表面和肤浅的。用国外的话语体系来裁剪中国传统文化，与其说是理论创新，毋宁说是概念搬运。

三是肯定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力图将有机马克思主义理念引入中国实践中。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成功结合，并提出了所谓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引领论”，强调中国最有希望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承担起拯救人类文明的历史责任。有机马克思主义热切地希望将其理念注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短短数年间，柯布领导的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在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迅速成立了一百多家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研究机构，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推动者王治河、樊美筠推动创立的“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与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合作举办了多届生态文明研讨活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支持者们致力于将有机教育理念注入中国教育体系中。由此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试图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教育上构建“实践共识”，使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教育成为其思想理念的“试验地”。根本而言，这更是其构建“政治共识”和“文化共识”的真实意图所在。

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策略性”转型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高度赞扬。有学者认为，“在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有机马克思主义是目前为止唯一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①有学者认为，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新发展”，是一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②还有学者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融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范式。^③

“有机马克思主义热”直接源于其理论形态的“策略性转型”，部分学者的非理性助推了这一“学术狂欢”。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们对自身理论和文化的不自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尤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展示了强大的理论阐释力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由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还不够健全，话语权和影响力还有待提升，在学术研究上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里存在着“言必称西方”“言必称美国”的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④近年来，我们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自觉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坚定“四个自信”，这使中国学界对外来思潮有了更大的底气和信心，对待有机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有了更理性的研判。另一方面，随着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真实意图和理论危险日

① 杨志华：《何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视角的观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第80页。

② 王治河、高凯歌、樊美筠：《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厚道马克思主义》，《江海学刊》2016年第3期。

③ 冯颜利、孟献丽：《有机马克思主义：融通“中”“西”“马”的新范式》，《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11期。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9日第2版。

益明显，其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裁剪愈发显得简单粗糙。这双重因素促使“有机马克思主义热”从早期阶段的“狂热期”进入后期阶段的“冷静期”。

二、揭开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神秘面纱：理论本质的剖析

后期阶段，研究成果以反思和质疑为主。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成为讨论的焦点所在。有学者质疑有机马克思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①有学者指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过程神学的一件外衣。^②这些批判和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界对待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步入“冷静期”，但并不足以彻底消解有机马克思主义支持者们的“热情”。每隔一段时间，总有支持者们不懈地在各种期刊和论坛中吹捧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有机教育理念和生态文明观等，鼓吹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以及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优越性等。支持者们以一种更隐晦和间接的方式推动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生长。这说明，深刻剖析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仍然是必要且迫切的。考察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便可以发现，这只是一种粗糙简单的理论拼接，与真正的理论创新相差巨远。无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如何改头换面、乔装打扮，揭开其神秘面纱，其本质上是以过程哲学为理论基础、具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过程哲学的新形态。2014年，克莱顿和海因泽克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中率先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概念。但若追根溯源，该思潮早已有之。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柯布在《是否太晚?》和《为了共同的福祉》中就已经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自然性”。笔者认为，尽管未以“有机马克思主义”命名，但该思潮作为“有机哲学”或“过程思想”的发展形式，其基本理论主张、旨趣和基础已形成并获得一以贯之的发展。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又称为有机哲学，强调关联性、过程性和整体性，主张世界是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万物内在关联，处于变化之中，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体。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理论创新就是以过程哲学为理论基础，继承怀特海对现代哲学实体思维的批判，把过程哲学的世界观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如，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要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无限开放的历史过程，其过程性并不意味着一种社会必然趋向完美的进步思想，而是意味着开放的无限可能性。基于这种开放可能性，人们更需要具备有机整体的意识，因为现阶段出现的各种危机，比如生态危机，并不会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必然被治愈。世界万物有机联系，自然界的危机必然导致人类的危机。若不对生态危机加以重视治理的话，危机将带来毁灭。毫无疑问，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怀特海主义的“社会历史”版本。

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有机马克思主义明确地拒斥现代主义，主张用后现代主义建构生态文明的基础。他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囿于“现代性的局限”，俄国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僵化，德里达、齐泽克、哈维等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重解构轻实践。因此，他们试图进行从“现代”到“后现代”、由“无机”到“有机”的转换，建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大卫·格里芬首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其观点和构想皆来自于怀特

① 田世锭：《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吗?》，《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② 尹海洁，夏志军：《“有机马克思主义”是神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夏志军：《有机马克思主义：过程神学的一件外衣》，《科学与无神论》2020年第1期。

海的过程哲学。其基本主张有二：一是拒斥西方形而上学主客体相对立的二元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批判现代主义的祛魅世界观，主张后现代的返魅世界观；二是反对实体性思维，主张事件性思维，以内在价值和内部关系的事件取代物质实体。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将怀特海视为后现代运动的先锋之一，柯布曾直接将后现代用于指称怀特海的哲学。^①柯布和克莱顿等都长期自称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在自称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们仍然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以怀特海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仅能促进生态的解放，也能促进人类的解放。克莱顿倾向于将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生态原则之间的融合。柯布则强调一种建构在有机整体概念基础上的为了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共同体。虽然侧重点略有不同，但其共识是明确的，即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而其共同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他们所倡导的生态文明不过是一种前现代的、非机械化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这种对现代性的简单拒斥和“复古性”使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了显著的差异，同时更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本质性差别。

最后，有机马克思主义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过程神学是当代美国颇具影响力的神学流派。该神学流派以拯救“信仰上帝的危机”为宗旨，将号称“20世纪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怀特海的过程思想引入对宇宙的解释中，修正宗教以适应科学的新世界。过程神学试图融合科学与宗教，解决现代性发展所带来的基督教信仰危机，努力恢复和发展上帝在宇宙论中的本体地位。过程神学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怀特海在哈佛大学讲授哲学时期，30-50年代经哈茨霍恩和芝加哥学派获得发展。柯布是过程神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在未自冠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柯布是以过程神学家的名义在中国学界推介过程神学的。^②号称有机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的“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同时也是过程神学的研究基地，该中心隶属克莱蒙神学院。从过程神学到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再到有机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仍然无法掩盖其神学思想本质。在进入中国学界之后，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有意识地弱化了其宗教背景，但其宗教主张并没有改变。柯布直言：“作为一个思想家，我更多地是根据神学和社会中教会的作用而非一个世俗的观察者来看待历史的。”^③更明显的例证是，柯布在接受中国学者的采访中明确地将生态危机归咎于基督教的世俗化，“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做法违背了耶稣基督的意愿”^④。究其本质，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神学思想。

三、以超越为名行解构之实：潜在的理论风险

有机马克思主义自称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许多部分需要改变或进一步发展，所以，他们试图重构马克思主义，借此宣称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建构了一种新形式的、厚道的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一条解决生态危机、实现全人类福祉的生态

① [美] 大卫·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研究三十年》，王俊锋、周邦宪译，《哲学探索》第2辑，2021年8月，第5页。

② [美] 小约翰·B·柯布、[美] 大卫·R·格里芬：《过程神学：一个引导性的说明》，曲跃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美] 小约翰·B·柯布：《为什么信仰需要过程哲学》，黄铭译，《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等等。

③ [美] 小约翰·B·柯布：《马克思与怀特海》，曲跃厚译，《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第7页。

④ 孟根龙、[美] 小约翰·B·柯布：《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访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小约翰·B·柯布》，《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35页。

文明新道路。然而，并非所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①因此，判断的标准应该在于其是否秉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否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趣和理论本质。究其本质，有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反，他们妄图从历史观、方法论、价值取向、理论本质四个维度解构马克思主义。

第一，有机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理解为机械的历史决定论。他们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跳出黑格尔的思考框架。结果，他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②，有机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所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属于机械历史决定论，都是现代主义的产物。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问题：一是主张线性历史观，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忽略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把历史发展简单地描绘成一个必然的、进步的、具有明确的美好终点的过程。二是主张经济决定论，只注重经济基础，忽视上层建筑的作用，试图将全部社会还原为资本和生产工具的基本力量。

针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宣称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进行根本性的重构。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开放性。人们可以努力建构一个健康的、蓬勃发展的社会，但需要放弃“未来主义”倾向和乌托邦理想。简言之，“发展过程取代了趋向完美的过程”^③。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建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

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为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实质上是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相混淆。以拒斥线性历史观和经济决定论为口号试图解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常用的粗劣做法。早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曾针对将马克思主义误解为“经济决定论”进行澄清。揭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性贡献之一。经典马克思主义从未认为生产力和物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唯一动力，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文化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片面地把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看作是决定一切的东西。这一错误做法很快得到了后继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和纠正。卢卡奇基于总体性辩证法提出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马尔库塞提出了单向度理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等进行了反思，这都是理论体系的自我匡正和传承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但对规律性的理解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上的。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社会历史发展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同时会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特殊性和不可预测性。特殊性和不可预测性源于偶然性，而偶然性之中有必然性，必然性之中寄寓着偶然性，二者辩证统一于现实的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中。实践实现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提供了社会历史趋向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空间。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定了社会历史趋向以及人们的活动要受规律性的制约，但并不否定人们在可能性空间内的自主选择。由此，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② [美]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1页。

③ [美]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第72页。

史”。在此意义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线性历史观，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曲解。历史唯物主义并不预设一个必然的、线性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并不事先描绘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未来，而是深入挖掘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展示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呈现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性进程。

第二，有机马克思主义试图使唯物辩证法倒退为有机论。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西方形而上学实体思维，认为现代西方形而上学实体观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有机马克思主义毫不犹豫地将马克思主义归为现代形而上学实体观范围内。有机马克思主义自豪地宣布，怀特海的形而上学可以使人们走出个人与社会二元论“顾此失彼”的关系漩涡。他们自觉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即将有机思维注入马克思主义中。

有机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归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忽视马克思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中生成的，而不是先验设定的。在马克思那里，主体和客体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能动关系。主体是实践的主体，他不是纯粹自然或抽象的个人，也不是精神、理念，而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既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历史存在物。客体是实践的对象，它不是直观的对象，也不是理性的抽象，它首先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同时更是被历史地和社会地规定着的。实践开启了主客体辩证转化和统一的可能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马克思不再局限于在哲学层面上解决主客体二元对立问题，而是转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中考察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可以说，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超越了形而上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问题。

对辩证唯物主义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视为一个联系发展的有机统一体，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把人类社会、自然界和思维领域中的一切现象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性过程，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主张。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只停留于描述有机体处于联系发展的过程这些表面现象而将背后的动力原因简单归于上帝不同，马克思主义早就深刻地挖掘了现象背后的动力和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从根本上解答了事物为什么会发展的问题。

事实上，把唯物辩证法重构为有机论，这不是超越，而是倒退。有机马克思主义只是简单直接地把生物学的有机范式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试图以此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作法如出一辙。在这一点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洞察显然更为深刻。“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成为总体的。生成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①马克思还挖掘了社会有机体生成变化的根本性动力源泉，即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

第三，有机马克思主义企图神学化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马克思严厉批判基督教，但马克思与基督教之间有着亲近性与一致性。首先是先知传统。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的犹太人身份：“我认为在现代世界，马克思是最伟大的先知。在先知传统中，我们基督徒视他如弟兄。”^②先知传统有两个特点：一是批判精神。先知有着更高的忠诚对象，所以他们可以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② B·柯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第69页。

惧当前的政治统治者，不拘泥于所属的文化传统，无所畏惧且苛刻地批判同时代人的所思所为。二是自下而上的视角。柯布认为，美国许多教会领袖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与马克思一样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观察历史与现状。其次是解放神学。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基督教原理的融合产生了解放神学，建立推动了后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者只是特定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的真正含义。言下之意，只有基督徒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含义。

由此可见，神学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进行价值目标的置换，即否定共产主义，追求共同福祉。有机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定性为追求共同福祉的理论，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提供共同福祉的社会，自称为“追求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马克思主义”^①。有学者认为，共同福祉思想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实质上是混淆了共同福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区别，无视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共同福祉替代共产主义的企图。共同福祉的价值依据是上帝之爱。共同福祉思想表面上追求人、自然、社会有机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关注阶级不平等和生态正义，但其价值设定来源于上帝对被创造之物的平等之爱。有机马克思主义明确反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共产主义是被确证的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只有代之以追求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才是人类最终的出路。

第四，有机马克思主义企图后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性哲学纲领，满足不了后现代世界的需要，所以要用最新理论资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胆的重建。何为“最新理论资源”？那就是后现代主义。“就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真正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将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在后现代语境下重建马克思主义”^②。甚至，他们还企图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化。“我希望中国的过程研究中心将大力支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有机马克思主义’。”^③

如何在中国运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柯布等人描绘了“理想蓝图”。首先，倡导有机教育是基础。他们认为，当前的中国教育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以竞争为基础专为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工人，它鼓励腐败却又通过惩罚来减少腐败。有机马克思主义开出的“妙方”是有机教育。其次，改变经济体制是根本。柯布指出：“我知道现在中国致力于‘市场社会主义’。在我看来，这有点像在滑向成熟的资本主义。”^④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推销其“非公非私”的混合型经济体制。所谓的混合型经济体制，不是对现有经济体制的超越和发展，而是历史的倒退，成为一种小型农业社会共同体。最后，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关键。他们自认为，其理论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资源，因此可以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实践。对于有机马克思主义而言，“有机的”意味着“生态的”。在肯定了当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后，有机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地试图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导向后现代化。

[责任编辑 林 卉]

① 王治河：《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② [美]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2015年，第9、11页。

③ B·柯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第71页。

④ B·柯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第72页。